

从世界市场视角看 18 世纪以来的中国茶业

——《近世以来世界茶叶市场与中国茶业》评述

付坚强

(南京农业大学 人文与社会发展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95)

【摘要】自 19 世纪中叶起, 中国茶业由垄断国际市场快速走向全面且无法逆转的衰落。对于其中所涉国际竞争、经济规律、政商关系、价格机制等前沿性问题, 石涛所著《近世以来世界茶叶市场与中国茶业》在新视角与新史料的基础上进行了有益探索。近代中国茶业受国际竞争、国家政治与经济规律的多重挤压, 晋商作为茶业主体一直未能实现利润的有效传导及分配。19 世纪中叶之前, 中外贸易服务于清政府的羁縻边境国策, 茶叶交易更多出于交换关系之维系, 生产与销售的脱节使得国内茶商缺乏议价权。19 世纪中叶之后, 中美假茶问题导致中方失去了通过卖方需求端来提升华茶“价格-质量”良性互动的机会, 中俄恰克图贸易中俄方却利用中方对皮毛的旺盛需求实现了产业升级。在无法参与世界市场利润分割的情况下, 国内产业链条中的利润分配更加阻滞, 茶商虽拥有生产垄断权但始终受政府的严格控制, 更重要的是, 茶商的利润率与资本积累一直没有对国内就业、劳动生产率、资金投入以及技术创新产生正向刺激, 反而通过建立卡特尔联盟将成本转嫁到组织外部, 从而造成最底层茶农的贫困。此外, 从世界市场与中国茶业的相对静态分析来看, 经济史研究成果的最佳构想既离不开历史视角下的归纳, 也离不开经济视角的逻辑抽象, 两者应在整体上保持逻辑与历史的一致性。

【关键词】价格悖论; 近代茶业; 世界市场; 华茶

【中图分类号】S-09; K20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4459(2022)01-0117-08

Chinese Tea Industry since the 18th Centur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World Market: The Review of *The World Tea Market and China's Tea Industry Since Modern Times*

FU Jian-qiang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Development, Nanji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5)

Abstract: Since the middle of the 19th century, China's tea industry has rapidly moved from monopolizing the international market to a comprehensive and irreversible decline. Shi Tao's *The World Tea Market and China's Tea Industry Since Modern Times* has made a useful exploration on the cutting-edge issues involved in the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economic laws, political and business relations and value mechanism on the basis of new perspectives and new historical materials. Before the mid-19th century, Chinese and foreign trade needed to serve the border state policy of the Qing government. Tea trading was more due to the maintenance of exchange relations. The disconnection between production and sales made domestic tea merchants lack bargaining power; After the mid-19th century, the problem of fake tea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led China to lose the opportunity to realize the benign interaction of "price-quality" based on the seller's demand, while Russia in Kyakhta trade took advantage of China's demand for fur to realize industrial upgrading. In the case of being unable to participate in the profit division of the world market, the profit

【收稿日期】2021-09-17

【作者简介】付坚强(1972-), 男, 南京农业大学人文与社会发展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为农村史。

distribution in the domestic industrial chain was more blocked. Although tea merchants had the production monopoly, they were always strictly controlled by the government. More importantly, the profit margin and capital accumulation of tea merchants had not positively stimulated domestic employment, labor productivity, capital investment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On the contrary, they had transferred the cost to the outside of the organization through the establishment of cartel alliance, resulting in the poverty of the lowest tea farmers. In addition, the relative static analysis based on the world market and China's tea industry showed that the best conception of the research results of economic history is inseparable from the induction from the historical perspective and the logical abstraction from the economic perspective. On the whole, the consistency between logic and history should be maintained.

Key words: price paradox; modern tea industry; world market; China tea

茶历来是我国重要的贸易物资。与盐、铁等必需品不同,茶叶所具有的独特功效和文化价值使其具备了作为一般消费品进行交易的可能。在古代,茶不仅是对内羁縻边境的纽带,同时也是中国进入世界市场的关键性商品。自17世纪起,华茶就成为世界茶叶市场中不可替代的主角。同时,中国对商业活动的理解也开始不同于以往,18世纪后更逐渐有意识地将“商业”作为一种正常社会活动进行培育、发展与保护,加之社会分工的细化、城镇的兴起、交通运输业的发展和货币体系的完善,商业贸易活动的时空界限不仅屡屡被打破,而且以血缘与业缘为纽带的商人群体联盟开始凭借商业信用,对商贸活动进行局部干预,以期达到影响商业利润配置和贸易关系的目的。

受内外形势的交相影响,华茶的国际贸易曾经历兴衰起伏的变化,这不仅对中国茶业、商业,乃至对大国国运的兴衰都产生了重大影响,特别是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以华茶为代表的中国商品在世界市场中的全面衰退,是为中国商业发展中的一次沉重打击^①。过去我们将这一现象与过程主要归因于包括鸦片战争在内各国间政治层面调整的结果,但贸易链内外的利润分配结构同样需要予以关注,特别是其中的政商关系、价格机制、利润传导、商业路径等都是难以回避的基本问题。对此,石涛在新史料与新方法的基础上,尝试跳脱传统经济学工具结合历史学假设的模式,从世界茶叶市场的供需关系出发,进行前沿性探索,其新著《近世以来世界茶叶市场与中国茶业》就成为回应上述关切的一部具有借鉴价值和比较意义的作品。

一、政治驱动下的“边茶”新视角与市场需求下的“假茶”新史料

市场是经济学的核心概念,其基本含义是买卖双方进行交易的空间^②。如果将1662年葡萄牙公主凯瑟琳携华茶嫁入英国^③作为茶叶世界市场开始出现的标志性事件,那么至少在17世纪,中国茶叶就已经被纳入欧洲各国上层社会的采购清单。此后两个多世纪里,西方各国对华茶的基本认知经历了从神奇的“东方药草”到高雅的奢侈饮品^④,再到全民普及的日常饮料等多个阶段。近世以来商业交换活动频仍,华茶供给和需求端任何一方的变化都会对其在国际市场的表现产生重大影响,而这种影响往往是通过“销量”与“价格”来表征^⑤,故从茶叶外销数量与价格入手来厘清其变化脉络,往往能直观有效地反映

① 陈慈玉:《近代中国茶业之发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45页。

② 吴敬琏:《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中国经济出版社,1993年,第129页。

③ 《中国茶典》编委会编:《中国茶典》,贵州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294页。

④ 陈春晓:《中国茶在波斯、阿拉伯地区的早期传播》,《中国农史》2021年第3期。

⑤ 董晓汾、韩笑、石涛:《19世纪中叶英美茶税政策与华茶出口》,《中国农史》2020年第6期。

近世以来中国茶业的“基本面”与基本趋势。

作为茶叶生产与供给方的中国传统社会对“国家”概念的认知历来较为模糊^①。从法制角度看,政府对经济发展和市场活动领域拥有绝对的控制权,其与外族进行交往的目的大多是为了遏控边境与寻求政治稳定,因而对茶叶海外贸易的态度相当暧昧。在此情况下,华茶主要依靠以晋商为主体的中国商人群体来开展从内陆产区到出口口岸的运营。17 世纪至 20 世纪 40 年代,华茶贸易的国内线路主要有两条:一是经张家口、恰克图等陆上常关抵达俄国的北路贸易,二是自闽、苏、皖、浙等地,通过广州、厦门等海关,运往东南亚、西欧和美洲的南路贸易。按石涛所揭,从边贸管理体系看,中俄恰克图贸易更贴近于现代双边自由贸易,“不仅出现了类似双边贸易协定的契约,且不进行榷税,自由度极高,而南部的广州海关通过十三行等代理机构以官方力量控制商人交易”^②。二者所处市场环境存在的现实差异,使得对北路贸易供给、销售和交易形式的探讨更有利于还原近代市场自由发展的供需变化。

然而,即使面临相同的市场条件,不同治理目标的干预下获取高额商业利差对经济产生的影响也可能大相径庭。虽说在中国传统国家政权的认知中,商业在国家财政体系中的地位始终不高,政府对商业的财政贡献率也并不关注,更不会对海外贸易的价格进行干预和管控,但单就中外边贸活动所内蕴的巨大政治属性就必然使其受政府权力所影响,例如互市条约之所以能够成功签订,一个重要原因便是大清皇帝的认同^③,以至于中国内陆地区通常会取代国境区成为同洋商洽谈和交易的地点(恰克图即是最好的实例之一)。我们认为此现象产生的部分原因还在于买卖双方之间对茶叶商品属性的定义差异,如就作为买方的俄国而言,茶叶贸易与其他种类的国际贸易商品实际并无不同,都是用于套利,但作为卖方的清政府却未必同等视之,其控制之下的茶叶、大黄、丝绸、瓷器等大宗商品的输出更偏向于是一种调节边境关系的政治手段,简而言之,即通过“易”之形式与牺牲“贸”之商业收益,来换取“边”之政治稳定。

由此来看,书中称呼“对外交易”确实要比“国际贸易”更为恰当^④。在“国际贸易”活动中,国内政策安排与商贸主体的首要目标都是商业利润的最大化,商品交换规模的扩大会对国内就业、劳动生产率、资金投入以及技术创新产生正向刺激,从而达到以规模经济带动经济增长的效果。而在所谓“对外贸易”活动中,以羁縻为主要目标的政府在进行策略选择时并不会因商业需求而有所转移,这样就会抑制本国商人在达成交易方面的主观能动性。在此局面下,中国茶商极易陷入一种既难以完全退出交易,又无法扩大规模的两难困境中,无论在恰克图还是广州,一旦国内的供应链允许外籍商人参与,本国商人的市场份额便会被迅速压缩和挤占,从而形成出口额与出口量的倒挂。

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逐渐丧失国际茶叶市场供给垄断地位的过程中,中美贸易似乎是一个特例。初期华茶厂商囿于产量主动选择进行伪劣茶叶的交易,至 19 世纪后期外商买办深入中国茶区进行交易后,假茶的泛滥之势仍不可阻挡,假茶泛滥甚至成为导致中美茶叶贸易盛衰转折的关键问题^⑤。直接参与当时中美贸易的美国茶商对此颇具发言权,他们为本书的研究结论提供了相当丰富的资料证据。书中重点着墨的奈伊(Gideon Nye)是一位 19 世纪上半叶在广州经营华茶海外贸易的美籍洋商,他根据自身从业经历,对 19 世纪 20 年代至 50 年代的中美贸易进行了记录,后著成《茶叶与茶叶贸易》(*Tea and the Tea Trade*)连续发表在《商人》杂志上。石涛发现,这一历史记录不仅在学界鲜有关注,而且与美国历史学家拉图雷特(Kenneth Scott Latourette)对中美茶叶交易量的考察几乎完全相符^⑥,据此,他对美国市场

① 石涛:《近世以来世界茶叶市场与中国茶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 年,第 24 页。

② 《近世以来世界茶叶市场与中国茶业》,第 25 页。

③ 《近世以来世界茶叶市场与中国茶业》,第 38 页。

④ 《近世以来世界茶叶市场与中国茶业》,第 26 页。

⑤ 石涛、董晓汾、卫宇:《19 世纪上半叶中美茶叶贸易中假茶问题研究》,《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 年第 6 期。

⑥ 《近世以来世界茶叶市场与中国茶业》,第 143 页。

的假茶数量进行了估算,揭示出“尽管假茶的流动具有相对较强的隐蔽性,但在美国具有普遍而稳定的市场需求”^①的社会事实。当华茶在初期具有供给垄断权时,低鉴别能力、宽松政府管制下的市场贩假风险要远低于回报。华茶口碑的下降并不会真正影响茶叶销量的增长,反而会进一步激发出华茶产区制假工艺技术更新的巨大动力,以至于假茶长期是美国市场交易的绝对主角,甚至一度达到总量的95%以上^②。当然,这种虚假繁荣在19世纪后期以印度、斯里兰卡和日本等地为代表的茶产品逐渐显露头角之后很快就不复存在,至20世纪初输美华茶占比已经不足10%^③。

华茶世界市场份额迅速下降的同时,以英国为代表的外国茶商也在着力推动印度茶进入中国市场,以川藏南路边茶为代表的引岸贸易在当时颇受关注。为打开西藏市场,英国政府和东印度公司多次派遣官员、学者、商人等前往当地考察。打箭炉是四川与西藏贸迁有无的咽喉,奥地利籍外交官罗斯通(A. De Rosthorn)于1895年在英国伦敦出版的《四川西部的茶叶种植与川藏边路茶叶贸易》(*On the Tea Cultivation in Western Ssuch'uan and the Tea Trade With Tibet Via Tachienlu*)一书记录了当地茶叶长途贸易运销、管理、税收等各环节的长期运行情况,这为石涛对于川藏贸易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数据资料。在罗斯通(A. De Rosthorn)的佐证下,南路边茶因供给稳定^④而长期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即使从事粗放式的生产和运输,茶商仍可以具有充分的动机以获取高额商业利润。这一发现直接促成了印茶入藏的热潮,尽管欧洲各国对印茶在西藏市场获取的份额分配预期存在差异^⑤,但川茶的垄断地位被打破乃是公认的事实。

二、华茶衰微根因:围绕经济内生因素的讨论

17—18世纪,茶叶逐渐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的大宗商品,期间华茶对外贸易空前繁荣,甚至一度独霸国际茶市,中国也成功凭借茶叶贸易解锁了闭关锁国背景下向全球化主动融入的经济格局^⑥。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上半叶,随着印度茶的崛起,华茶又经历了由垄断竞争市场到寡头垄断市场,再到贸易急剧衰退的三个阶段^⑦,期间以茶叶为主要商品所形成的市场运行机制不仅是国际市场环境变化的映射,同时也深受国内茶叶生产链条运营的影响。

(一)经济因素的决定性

从市场内生的角度出发,需求、购买意愿和支付能力是影响茶叶国际贸易的三项核心要素。中国对不同国家的外贸需求除政治因素外,主要来自于产业分工不同所形成的比较优势,其他国家的购买意愿与该国民的消费偏好和能力,而支付能力则较大幅度地受国际形势约束下的交易成本影响^⑧。

首先,产业结构差异决定了茶叶贸易的经济结构。从国际分工的角度来看,国际贸易的发生源于不同国家间的技术比较优势,从形式上看是一种跨地域的产业间贸易。随着商业利润的产生,这种分工的专业化和彼此的贸易联结会进一步巩固并长期持续。虽然清政府的对外贸易政策以遏控边境为要,但也基本不影响与其他国家进行产品交换,甚至在这种情况下以物易物的交易形式更加普遍。以书中所

①《近世以来世界茶叶市场与中国茶业》,第145页。

②《近世以来世界茶叶市场与中国茶业》,第146—147页。

③《近世以来世界茶叶市场与中国茶业》,第148页。

④石涛、李欢:《晚清川藏南路边茶探析》,《清史研究》2012年第4期。

⑤曹必宏:《民国时期内地与西藏的边茶贸易——以档案史料为中心的考察》,《思想战线》2015年第1期。

⑥仲伟民:《茶叶与鸦片:十九世纪经济全球化中的中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第3页。

⑦陶德臣:《近代中国茶叶对外贸易的发展阶段与特点》,《中国农史》1996年第2期。

⑧居祥、肖智:《近70年来全球茶叶贸易空间格局演变及其趋势》,《经济地理》2020年第8期。

引恰克图贸易为例,茶叶和皮毛分别作为早期中俄各自输送的主要商品,销售额增长率的逐年攀升推动俄国致力于纺织工业的技术革新,并实现了由毛皮等原料出口向呢绒等棉毛制品出口的产品结构性升级,而作为原料供应地的新疆也出现了专业化棉花种植的趋势^①。正是这种产出结构的差异,才是中俄茶叶贸易源源不断的动力,也是俄国向中国内地扩张以及恰克图贸易结构变迁的经济动因。

其次,国际市场偏好决定了茶叶贸易的发展方向。中国古代茶叶生产种类众多,但最初彼此之间并没有严格的等级划分^②,除贡茶外,其余茶产品间仅依据发酵工艺、色泽和茶叶产地进行简单区分。自中国茶叶传入西方国家并成为国际性商品后,由于西方各国对茶叶的鉴别能力有限,最初的交易商品以红茶与绿茶为主。随着茶叶作为功能性饮料对酒、咖啡等的替代和普及,国际范围内的华茶需求不断增长,对进口茶叶的品质需求也逐渐呈现多元化的特点,例如:俄国以进口黑茶为主,英国市场上的红茶需求更高,而美国人则对绿茶更为偏爱^③。受此影响,华茶出口结构不得不随之波动。之后,随着欧美国家对茶叶品质认知的进一步深入,加之 18 世纪以来茶税政策的变更与推行,俄、英、美三国的华茶进口偏好又分别转向了品质一般的砖茶、高品质茶以及粗制劣茶^④。

再次,国际力量和贸易政策的调整决定了交易的实现方式。清代中国茶叶的国内交易以引岸专卖为主,这一政策理念在对外贸易中也得到相当程度的贯彻,即茶叶交易的产生更多出于交换关系的维系,一旦完成茶叶交付,这种依靠交换获取的关系便已经完成,因而产生了供给与销售环节的分离,中国逐渐沦为世界茶叶市场的原料供应方,销售利润则交由他国经销商分配^⑤。交易规模的爆炸式增长使得具有一致性交易规则的商品交易机构网络成为更具竞争力的选择,到 19 世纪末中国内地开始出现具有商品交易经纪性质的场所及人员^⑥,但商人在茶叶生产方面的获利空间被进一步挤占。其后随着资源的垄断状态被打破,中国茶业很快失去原有的市场地位。尽管清政府自 19 世纪晚期开始努力振兴中国茶业,并采取了一系列因应措施,但由于茶叶生产链条内生性障碍的存在,最终还是没能挽回颓势。

(二) 利润在茶产业链条诸环节中分配的阻滞

华茶国际产业链中,茶叶供给与茶叶销售是完全独立的两个环节。直至 19 世纪上半叶,中国仍然是唯一的茶叶供给者。茶叶的销售环节则由俄、英、美等国在恰克图、广州等口岸接手,以晋商为代表的中国茶商通过广州、恰克图等地将茶叶销往欧美等国家,一旦卖出,利润闭环即刻形成,茶商不再参与产业内的利润分割。英、美、俄等国商人却可以在获取到中国茶叶后,依据对世界市场供求差距的调整以获取更大规模的收益。随着世界各国对茶叶需求的增长,世界市场上的供给逐渐由华茶的绝对垄断转向印度、斯里兰卡、日本等多个国家或地区共同竞争,销售则由欧洲各国的自由参与变为中、俄、美三足鼎立。中国茶叶在世界市场上处于垄断的时期正是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由自由竞争向垄断过渡的阶段,从中国商人的角度而言,生产贸易垄断权的丧失导致政策供给和产业发展产生了一定调整^⑦。自由竞争所导致的国家与社会选择往往使得销售方国家中的企业极具竞争力,但似乎中国是个例外。按石涛一书所揭示,中国茶业的运作之所以能一直延续垄断竞争企业获取超额利润的模式,是因为虽然运输能力

① 张喜琴、李阳:《清代中俄三大边贸区的差异性及历史启示》,《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 年第 3 期。

② 刘馨秋:《六朝建康茶文化中心形成论》,《中国农史》2020 年第 6 期。

③ 《近世以来世界茶叶市场与中国茶业》,第 245 页。

④ 董晓汾、韩笑、石涛:《19 世纪中叶英美茶税政策与华茶出口》,《中国农史》2020 年第 6 期。

⑤ Jiajin Chen, Yong Lu, From prosperity to decline: the world tea market and Chinese tea industry since modern tim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conomics, *China Agricultural Economic Review*, Vol. 13, No. 4, 2021, pp. 930-936.

⑥ 聂好春:《买办与近代中国经济发展研究 1840—1927》,贵州人民出版社,2014 年,第 48 页。

⑦ 樊汇川、石云里:《清末民初的境外茶业考察及其影响》,《中国农史》2018 年第 2 期。

较低、运输方式繁杂、购茶询价艰难,但仍能凭借对供给数量的控制使得茶叶交易拥有高额的附加利润,而茶叶产区内的生产链条主要包括茶农、茶厂、茶栈、茶号和茶行等环节,各环节流通速度的快慢和交易成本的高低都会对整体交易产生影响^①。

其次,政府治理目标也是约束茶商策略选择的重要因素,在国家对茶叶进行严格控制的前提下,山西商人不能与山西周边地区,如陕西、山东等地产茶区进行合作,因此只能“舍近求远”,不远千里前往福建、湖广等政策宽松区域进行采购,并跋涉九千多里前往恰克图市场贩售这种“南方嘉木”。另一方面,茶商的利润率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为中国商业资本的积累,而商人对这部分资本用途的选择亦有不同,或用于扩大再生产,或用于技术研发,或用于固定资产投资,甚至流向其他产业,不同的经济选择对国家经济运行的影响也完全不同。中国古代社会很早就认识到商业利润的可观性,所谓“夫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②,因而社会上对经商的职业追求也逐渐强烈起来。有清一代,以远距离、跨地域为特点的商业贸易繁盛发展,但政治制度供给不敷经济需求,而且缺乏国家信用的参与所建立起来的社会信用体系,商人便不可避免地成为其中相当重要的环节^③。在生产投资受限的前提下,对商人而言最有利可图的领域是那些产业化水平较低的日用必需品,如盐、粮、棉布,或者弹性较大的准刚性经济作物,如茶、丝等。中国十大商帮之一的晋商就以茶叶为主营业务,极盛时甚至完全垄断北路贸易,形成了集种植、生产(或采购)、加工、运输和销售为一体的规模性经营^④,其所开创的万里茶路至今仍颇负盛名。

随着专业化分工和产业链延伸,商品在流通环节中的附加值迅速上升,而以多节点为中心所建立的卡特尔联盟势必会带来一定的组织内交易成本,而且会进一步试图将其转嫁到组织外部。如果个体商人或商会建立起各自的产权安排,在达到均衡时,制度体系间的交易成本就可能会压缩原本应处于生产环节的社会可支配资本,尤其是用于生产性技术创新的投入,从而导致生产者的生产收益降低甚至可能不敷生活成本^⑤。为防止对商业利润的追逐动摇农本国家之根基,清代政府屡有限制经商、劝导从农的诏令,以从宏观上对人口的职业结构进行干预,但大都事与愿违。事实证明,无论设关还是征税都无法阻挡理性预期的影响,最终的实际效果是不仅没有有效调节三次产业的人口数量,反倒促使用于流通领域的无效资本大幅增加。更何况清代交通运输业尚不发达,长途商业贸易成本的高涨与设关征税一样,同样会对商品价格产生影响,并最终转嫁到消费者身上,因此清代中国商业的迅猛发展不仅没有为社会积累足够的产业资本,产业链条的延伸和规模的扩大反而加速了社会运行成本的上升和资源的耗散,生产性投资也随之减少。

在经过长时段的发展后,生产性技术创新几乎完全被非生产性技术创新所挤占。即使山西商人前往福建崇安获取茶叶,再远赴恰克图销售,仍能获取七成以上的超额利润,但这部分商业资本不能产生向产业内流动的动力,劳动生产率和商品产量的增长只能依赖土地和劳动力投入的增加。由于产业间利润率存在剪刀差的“引力”,农业生产想要维持足够多的劳动力就相当困难,因此耕地面积的扩张便成为经济发展的唯一手段,政府虽然不会对商业活动进行过多干预,但仍然会不遗余力完成“开疆拓土”之任务。就这一点而言,清代通用的做法是以政治上的占用和军事上的占领为起点,并通过商人信用逐步将商业网络的触角延伸至开发区,也就是石涛所言之“军事占领——商业流通——经济开发”模式^⑥。

① 《近世以来世界茶叶市场与中国茶业》,第178-180页。

② [汉]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第3274页。

③ 章珂熔、胡燕、应瑞瑶:《宋代茶政的当代追问——以茶叶经济制度为例》,《中国农史》2020年第2期。

④ 张正明主编,宋丽莉、张舒副主编:《明清晋商商业资料选编下》,山西经济出版社,2016年,第455页。

⑤ 陶德臣:《近代中国茶农的经营状况(1840—1917)》,《中国农史》2003年第1期。

⑥ 石涛:《近世以来世界茶叶市场与中国茶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第24页。

三、相对静态分析的优势与不足：弥合经济与历史研究界限的尝试

从学科属性来讲,经济学与历史学虽同属于社会科学分支,但在研究范式上的差异始终使得两者的研究具有相当程度的不兼容性,即使是二者交叉融合所产生的经济史学科内,这种学科间的对话途径仍然乏善可陈。自吴承明先生提出“史无定法”^①以来,学界关于经济史学科的研究范式逐渐呈现出以经济学和历史学为首、各学科多元杂糅的趋势,但学者们关于历史学与经济学在方法论和价值观中的使用仍然泾渭分明,特别是关于经济理论与方法是否能用于历史研究,或如何在历史研究中运用经济学方法常是争论的热点问题。

历史学者对经济学方法论适用性的第一个诟病就是度量方法的极端化。书中指出,经济学科的研究方法和分析工具的尖端化已经达到了其他社会科学难以比拟的程度,而且业已成为引领学科发展的风向标,部分学者甚至以“经济帝国主义”^②概之。受此影响,对史料的数据化处理也已成为经济史研究的主流趋势。此等做法并无不妥,统计学是对现实进行描述的一种相当客观的工具——统计数字描述了历史事实,并且证明了它。然而,部分研究却试图顺势将数学关系同数据相等同,强调经济史也应像理论经济学那样遵循从定性到定量的发展规律。事实上,当数学关系被引入经济理论后,经济理论反而远离了经济史领域的探讨。正如马克思对英国古典经济学的一个重要批判:它是抽掉了活生生历史的“肤浅的表象”^③,经济史进行量化研究的根本目的应是在抛开现实纷杂因素的情况下,对经济活动主体的行为规律进行准确刻画。在此体系中发生的任何价值上升均被认为是某种“收益”,而价值下降则是某种“损失”,一旦这种转化存在某种缺陷或障碍,经济学往往就对其衡量束手无策^④,甚至某种程度上这种基于数理方面所进行的处理对经济行为本身是否具有意义也值得进一步商榷。诚如石涛所指,此时经济理论不仅丧失了对未来的预测功能,而且其本身对历史的描述也捉襟见肘^⑤。

另一个问题在于“经济理论对现实的理解力”,这也是众多具有历史学科背景的研究者并不对经济学研究成果抱有太高期望的根本原因。因为这门科学研究的仅仅是自己制造出来的“理性人”,而不能与现实生活和行为方式相对应^⑥。对经济学者来说,经济规律、经济理论同经济史的关系,与逻辑、数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关系是一致的。但是,历史事件总是极其复杂的,既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也无法如实验室一般任意控制变量,所以经济理论通常来源于人类自身的理性,而不是从经验当中学习。在进行某一项经济学视角下的经济史研究时,首先需要做的是抽象为“一般静态均衡”,即采用某种规则以一种状态替代另一些状态。对此,石涛指出,相对静态分析可能会构建出非常自洽的完美逻辑,但同时也将经济理论与历史现象间的匹配程度降至最低,它能够解释标准的、非现实的理性人产生的所有行为,但却不能解释具有历史价值的个体决策。通俗来讲,即经济学中的经济史研究只能解释个人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策略选择,而不是为什么需要做出选择,因此经济史研究只能作为一门分析的学科,其最主要的现实意义是对社会发展的“解释力”而不是“理解力”。

有鉴于此,我们认为重建历史对经济学的“意义”以及经济在历史中“意义”的努力在经济史学科发

① 吴承明:《经济史学的理论与方法》,《中国经济史研究》1999年第1期。

② 《近世以来世界茶叶市场与中国茶业》,“后记”第1页。

③ [德]马克思、[德]恩格斯著:《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39页。

④ Jiajin Chen, Yong Lu, From prosperity to decline: the world tea market and Chinese tea industry since modern tim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conomics, *China Agricultural Economic Review*, Vol. 13, No. 4, 2021, pp. 930-936.

⑤ 《近世以来世界茶叶市场与中国茶业》,“后记”第2页。

⑥ 《近世以来世界茶叶市场与中国茶业》,“后记”第2页。

展中至关重要。根据学科对话的途径,目前学界关于经济与历史融合的努力方向主要有两种:一是将历史视角引入经济学,主张在对大量同类历史事实进行剥离和抽取的基础上,通过对历史脉络的把握发现不同时期经济运行的相似之处及内在联系,解释经济行为的内在演变规律;二是以经济理论分析历史现象,更偏向以现有的经济工具寻找史实中与之相符的现象,并据此解释历史上的经济变化^①,实际上就是以史实作为检验经济理论正确性的证据。二者虽然目前尚存较大差异,但最终也可能不谋而合。

问题的关键在于,需要在何种意义上对经济学与历史学交叉融合的可能性进行探讨,即经济逻辑或者历史感是否是经济史研究中不可或缺的。诚如石涛所指,经济学思维简捷有力,能够透过现象直击本质,而历史现象却是纷繁复杂的,是否能被抽象为“经济问题”取决于分析方法的选取^②,一旦对经济意义的判定失误,经济学便与应用数学的分支相差无几,研究结果对历史事实的理解力会立刻遭到削弱。因此,将经济意义,即问题的范畴化作为研究的第一步至关重要。虽然历史不容假设,但依据历史感对历史进行理解性研究本身就相当依赖假设,就连历史研究相当程度上也是建立在假设前提之上。另一方面,对历史的理解需要长时段的观察基础,没有人能把历史的全貌作为研究对象,将相似的事实归纳类比进行静态碎片化分析比站在历史长河中反复体验更加快速而深刻,但是历史感在抽样过程中同样至关重要,因为任何一个时间断点都与在此之前发生的历史事件相勾连,尤其在经济史研究中体现得尤为明显。由于历史叙事与思想传统的不同,中国与西方的经济“国情”势必会呈现出相当程度的差异性,目前学界对“中西大分流”相关问题的反复而激烈的争论就是一个典型代表^③。虽然我们不能排除其他因素对这一分歧的贡献,但历史感的缺乏应是一重要原因。

由此看来,对经济史研究成果的最佳构想应该既离不开历史视角下的归纳,又离不开经济学视角下的逻辑抽象,另外,还应该在整体上加强“论从史出”的特点,即保持逻辑与历史的一致性。这里笔者并不想就各学科之间的分歧进行探讨,仅欲表明以经济学范式对历史事件进行合理研究的可能性,《近世以来世界茶叶市场与中国茶业》在这一方面进行了相当不错的实践,特别是所涉清代茶叶贸易之于中国国际关系、商业发展乃至政治经济运行规律的考察都能充分证明当前研究拥有向这一构想靠近的潜力。

结 语

茶叶的对外贸易是中国近世经济发展的缩影之一,这种“东方树叶”在国际市场上由炙手可热到无人问津的角色转化同样与中国经济结构和产业发展息息相关。在清政府的对外贸易活动中,“以茶制夷”是维系邻邦关系、证明政经实力的有力武器。为保障这种超然地位,中国很快意识到供给垄断的重要性,并且在长达两个多世纪的交易中未曾让步^④。然而,受限于海外贸易经验、国际分工和贸易政策,中国商人却并未在世界茶叶市场上取得压倒性的优势。在不能参与海外销售环节的情况下,垄断地位的丧失对中国茶业的打击几乎是致命的:定价权和销售质量均出现了坠崖式的下滑,出口量与出口额形成倒挂,并且利润分配链条中几乎没有任何一个环节具备增加华茶竞争力的正向刺激,以茶叶为代表的中国商品对外贸易只能走向全面衰落的困境。《近世以来世界茶叶市场与中国茶业》一书透过茶叶的国际贸易,为中外茶叶贸易兴衰、世界茶叶贸易格局变迁以及中国近代化迟滞等问题提供了较为合理的解释,而这正是以经济学解释历史现象的优势,同时也是对经济史进行科学研究的一个良好探索。

(责任编辑:胡文亮)

① 孙圣民:《经济学范式的应用:基于经济史研究的分析》,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第3-5页。

② 《近世以来世界茶叶市场与中国茶业》,“后记”第2页。

③ 易绵阳:《论经济史研究的经济学方法》,《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6期。

④ 刁莉、金靖壹、胡娟:《全球化视野下的近代中俄贸易:以棉布和茶叶为中心》,《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2期。